

中国自古就有共同语，中华文化的中心自古就在北方，共同语也历来是北方汉语，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书面文献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。

清末民初兴起的国语运动中，“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音”，这就是共同语的标准音，也就是后来的普通话。

1955年，新中国从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三方面明确了普通话的规范标准，将其作为汉语共同语向全国推广。

『国语』之变

文／本刊特约撰稿 辛世彪

历史悠久、幅员广大的国家都有共同语(lingua franca)，共同语往往由强势文化中的强势方言做代表，并有大量的书面文献。古希腊有东西南北四大方言群，东部方言群中的雅典方言成为古典时期的标准语。古罗马帝国东部以希腊语为共同语，西部以拉丁语为共同语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曾发生多次转移，现在的普通话并不是单线条从古代某个方言直接承传下来的。

先秦雅言与通语： 从秦晋洛方言到周洛方言

西周时期，今天的晋南、关中、洛阳、陇东一带应该使用同一种方言，可称为秦晋洛方言。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：“子所雅言：诗、书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雅言”(共同语)，就是西周王畿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一带的方言。周代一些重要的分封国都在今晋南一带，靠近王畿之地，因而周室语言也扩至整个晋南地区。《荀子·儒效》载：“周公兼制天下，立七十一国，姬姓独居五十三人。”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八年也说西周分封“兄弟之国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国者四十人”。姬姓之国所说的雅言扩展到北方受封各国。齐、鲁等国也是周代姬姓、姜姓两大集团的分封国，上层语言也是“雅言”，因此孔子能说雅言。

春秋时期，秦晋间战争不断，仅周襄王时大的战争就有韩原之战、崤之战、彭衙之战、王官之战、令狐之战、武城之战等。河东河西之地忽而属秦，忽而属晋，因而秦晋方言应当仍能保持相当的一致。

战国以后秦晋方言与周洛方言(雅言)开始有分歧。秦汉时期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是最重的基础方言，西汉扬雄的著作《方言》中，秦晋方言材料最多，解释也最细。但是《方言》中另有“通语”、“凡语”之名，后者就是周洛方言(雅言)，这说明秦晋方言与周洛方言有不同，这是因为前者受羌戎等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之故。

汉魏六朝： 金陵音与洛下音

自秦汉以来，中国北方一直有两种权威方言，一是西部的秦晋方言，二是东部的河洛方言。秦晋方言一直对山西及西北地区发挥权威影响，河洛方言则是后世中原一带通语的主要来源。

秦汉时期，秦晋方言仍是大体一致的，东汉后逐渐分化，这也是因匈奴、鲜卑等少数民族入居融合造成的。东汉时南匈奴内迁，山西北部和中都是迁入地之一。东汉以后，标准语逐渐过渡到东汉的河洛方言(洛阳音)。东汉至魏晋间，汉语语音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，就是因为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了转移。从此洛阳方言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方言，六朝时的通语，其直接源头之一就是洛阳话。直到晚唐，洛阳仍被认为居天地之中，禀气特正，语音最纯。

西晋初，匈奴人居山西中部，分为五部，关中北部也有羌人、氐人。西晋末五胡乱华以后，并州上党、司州河东移民南迁，山西中北部先后被匈奴、鲜卑占据。南北朝时期晋陕一带不断有少数民族进入，与汉人杂居通婚，直到隋唐才稳定下来。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，北方少数民族汉化严重，再加上关中与山西的地理条件不同，陕北、山西中北部的方言与晋南关中的方言差距越来越大，秦晋方言逐渐分化为南部的“晋南关中方言”和北部的“晋语”。

河洛方言随着“永嘉南渡”进入南方长江流域，因此，六朝时期共同语出现南北两个变体，“南染吴越，北杂夷虏”，“金陵音”实际上是“洛下”音的南方变体，它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本《一切经音义》。



古籍《正音咀华》书影。

们的统一体就是《切韵》音。金陵音与洛下音，就是六朝、隋、初唐时期南北方的共同语。

唐宋时期： 从关中方言到汴洛方言

唐代洛阳音和长安音是不同的。中唐以前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仍是作为标准语北方变体的洛阳音，唐初玄奘《一切经音义》反映的音系与《切韵》仍很接近。

武周时期(684—690)皂隶出身的关中礼泉人侯思止把“猪”说成“诛”、“鱼”说成“虞”、“驴”说成“缕(平声)”、“俱”说成“居”，把“鸡”说成“圭”，把“吃”说成“诘”，把“米”说成“珥”，惹得武则天，崔献可大笑，说明当时朝廷所用的标准音必定不是关中长安音。

唐代学者李肇斥“呼稻为讨，呼釜为付”的关中音为“坊中语”，也说明首都长安有雅音与俗音的分别。这就不难理解，唐初以中原洛阳音为标准的玄奘译音反映的音系，与盛唐及中唐以关中长安音为标准的不空译音和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所反映的音系不同。中唐以后汉语语音发生了一系列变化，这些音变都与标准音的转变有关，而且大都是从以长安为中心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开始，逐渐推向其他地区的。

南北朝、隋唐时期的洛阳音，实际上是中原河南一带通行的方言，也是北朝到初盛唐的标准音，后来发展成为宋代汴洛方言。晚唐李潜《刊误》中说：“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(洛阳)，盖居天地之中，禀气特正。”这表明洛阳音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具有正统地位。

北宋时共同语的标准音东移，汴洛方言成为中原正音，此后的各种官话方言以及南方方言都受其影响，但以关中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仍然对西北地区发生权威性影响，并成为西夏等国学习的汉语官话方言。有唐以来，许多重要的文献和经典都是用这种方言翻译和对音

的。南宋迁都临安(杭州)，但标准音仍是汴洛方言，这种共同语对江南吴语影响极大。南宋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说：“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，语音最正。”

元代共同语标准音的具体方言，尽管仍然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，但元代共同语是中原雅音，与汴洛方言关系密切，这点已无疑问。元代最重要的北曲韵书是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，其名称就已经说明了问题。

明清官话： 从南京音到北京音

明初定都南京，明成祖时才迁都北京，而且当时的北京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，并不存在所谓的北京音。明代至清中叶，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南京音(江淮音)，有5个声调，实际上它仍与中原的河洛方言关系密切，是明清官话(共同语)的南支，因此一些文献中仍然把这支官话称为中州音或中原音。这支官话在明清耶稣会传教士以及琉球官话教材中有清晰的记录，在闽粤琼等地南方方言的文读音中也保留着它的印记。

传教士利玛窦(M. Ricci, 1552—1610)的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记载，中华帝国各省都有方言、乡音，但是“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，被称为官话，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”，教庞迪我神父(D. Pantoja, 1571—1618)学说官话的男童讲“纯粹的南京话”。日本人在江户时代(1603—1869)学的汉语也是南京话，琉球官话课本《白姓官话》(1750)的标准音也是南京话。实际上，所谓的“南京音”也有文白之分，庞迪我跟男童学的是南京口语音，可称为“南京土话”或“南京方言”；日本人、琉球人所学以及在中国南方闽粤(琼)一带通行的“南京音”是读书音，可称为“南京官话”或“南方官话”。但是两者都有“阴阳上去入”5个声调。

清中叶后，满人入关带来的东北汉语逐渐成为标准音，这就是后来的北京音，它也是在宋元中原雅音基础上形成的，属于明清官话的北支。从统计资料来看，清代来京入户的外地人不少，但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所占比例最大，满语及汉语东北方言与北京口语的关系最近。

根据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的记录，19年中叶以前，各种记音材料描写的仍是南京话，可见南系官话的影响。清代咸丰年间满族学者莎彝尊在《正音咀华·十问》(1853)中说：“何为正音？答曰：遵依钦定《字典》、《音韵阐微》之字音即正音也。何为南音？答曰：古在江南省建都，即以江南省话为南音。何为北音？答曰：今在北燕建都，即以北京城话为北音。”这里说的南音、北音即明清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，分别是官话的南支与北支的口语音，正音即官话文读音，它是中原正音长期演变形成的结果。1880年代的日本人编写的官话课本《官话指南》中说：“中国话本难懂，各处有各处的乡谈，就是官话通行。我听见人说官话还分南北音哪。官话南北腔调儿不同，字音也差不多。”这里说的是作为标准语的官话口语音有南北两支。口语音之上还有读书音，也有南北之分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

关于历史上的共同语和普通话的来历，牵扯的问题比较多，比如各个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问题，明清时期南系官话与北系官话的文白读音问题，有些问题是逐渐认识清楚的，有些问题还在认识当中，学术界还有争论。无可争议的是，北方汉语自古至今都是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，留下大量宝贵的书面文献和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。汉语共同语经过长期演变，吸纳了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优秀成分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